



LUND UNIVERSITY

'Hanyu beijing zhong "laodong" he "zhiye" de hanyi jiqi dui zhiye jiaoyu de yingxiang [The Semantics of 'Work' and 'Profess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ulte, Barbara

Published in:

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Jiaoyu Kexueban)

2008

[Link to publication](#)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Schulte, B. (2008). 'Hanyu beijing zhong "laodong" he "zhiye" de hanyi jiqi dui zhiye jiaoyu de yingxiang [The Semantics of 'Work' and 'Profess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 (Jiaoyu Kexueban)*, (3), 126-130.

Total number of authors:

1

General rights

Unless other specific re-use rights are stated the following general rights apply: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Read more about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LUND UNIVERSITY

PO Box 117
221 00 Lund
+46 46-222 00 00

汉语背景中“劳动”和“职业”的含义 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德]芭芭拉·舒尔特¹, 王一凡², 彭正军²

(1.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比较教育系; 2.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汉语中的“文化”、“教育”、“职业”及“劳动”等概念为人们理解它们所表征的社会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尤其是“工作”和“教育”的概念对职业教育观念影响深远。

关键词: 文化; 职业; 劳动; 单位; 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13X(2008)03-0126-05

像中文里许多近代引入的概念诸如“科学”、“经济学”、“宗教”一样, 广泛使用的“职业”这一词汇也只是在20世纪才确立了它的现代含义。然而, “职业”并不是一个新词, 它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家)职业世界观的产物。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下面四个词汇的词源学和语义学分析, 来探讨这一职业世界: “文化”、“教育”(这两个是半新词汇)、“职业”和“劳动”。这四个概念以及表达它们的汉字反映了劳动组织所植根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汉语中, 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概念和实际的劳动组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我们以中国人所熟知的劳动组织——“单位”为例来说明这种对应性。中国的单位是一种结构化和社会化的实体, 并不必然是一种政治实体, 它对中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有着很深的影响。本文将指出, 若不对伴随着概念的社会含义的建构而出现的和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加以考虑, 语义分析是有缺陷的。例如, “秩序”和“和谐”通常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社会典型的和富有影响力的特征, 而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因此, 当我们探究像职业世界这样的语义建构时, 应该避免语义分析的不足和缺陷。

撰写本文的部分原因是, 中国在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同时, 或者说, 尽管中国在推进国家的现代化, 还出现了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种现象可能发端于20世

纪80年代的“文化热”)。这种需要并不像一些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 是新近产生的。19世纪的中体西用论争就反映了是保存中国自身传统文化, 还是创造性地吸收或盲目照搬西方文化的两难困境, 这种困境曾在无数不同的情况下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然而, 我们不可忽视近来出现的新现象: 学术界和普通民众越来越关注一切“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东西。这种“文化化”或“中国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报刊杂志、图书市场或电视节目的话题上, 而且也渗透到学术界和各种学科之中, 这从大学的课程设置与出版物中可以看出(可参见舒尔特的文章《论文化语言学的出现》, 2001年)。同时, 本文也强调指出, 这种文化癖性在一个被许多中国和西方教育专家认为是“去文化”的领域, 即职业和技术教育领域,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下面的讨论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劳动”、“职业”概念和背景所固有的不同层次的含义。总的说来, 职业教育研究本质上是描述性的, 且以政策为导向。因此, 本文旨在考察为什么某些思想出现了, 且随之还出现了(或从其他国家引进了)相应的工作系统, 而另一些思想和工作系统却没有出现; 本文还力图表明, 职业教育的新近发展与过去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并采取了不同的职业教育政策, 这种关联还是很

* 收稿日期: 2007-05-06

作者简介: 芭芭拉·舒尔特(Barbara Schulte), 博士, 汉学家,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比较教育系的助理讲师, 致力于东亚, 尤其是中国教育研究, 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的工作和职业; 王一凡(1983-), 女, 河北石家庄人,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05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学; 彭正军(1981-), 男, 安徽六安人,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05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学等方面的研究。

明显。

一、文化、教育、职业和劳动的概念背景

汉语中的“文化”由两个文字组成。第一个“文”字,传说最初是刻在龙或乌龟背上的某种线条或图画(Fazzioli 1987年:231)。后来,“文”开始意指书写文字的总体或更普遍地是指整个文学,此后又包含了文雅、文明之类(包括外交能力、劝说的艺术、知礼和通晓秘密的国家程序)的含义(Gernet 1972年:87)。“文”和“化”(简单,单纯)构成了理想的有教养的人。“文”也是中国古代官员所必须具备的两种素质之一,另一个素质是“武”,指的是军事技能和军事知识。早期的“士”(后来派生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者)既包括文士,也包括武士,但随着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文士在重要性上逐渐取代了武士,自7世纪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起,“武”这种素养就不再是必需的(Ma 1995年;Hu 1997年)。

“文化”的第二个汉字“化”象征着两个人,一个直立着,另一个倒立着,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化”字很快就被用作为后缀,与英语中的“-isation”相似(Wu 1995年:209)。“文”和“化”两个字的组合即“文化”与英语中的“cultivation”相近,甚至与德文中的“Bildung”也相近,它可以指国家的内部事务,也可以指个人的内在性(以及内在的教育)。“文化”在其语义的发展中,经历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转变,即从个体转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或社会。“文化”语义的这一发展很有趣。相反,拉丁文中的“文化”(cultura)[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源自拉丁文],经历了一个相反的转变,即从外(耕地)转向内,就像“陶冶灵魂”(cultura animi)中的使用一样(Wolf 1994年:1)。尤其在近几十年来,计算机产业(及其语言)的影响越来越大,中文直接从英语那里借用并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比如“控制中心”一词就是来自英文“control centre”的直接翻译。然而,“文化”一词从未出现在与农业或生物科学有关的术语中,而英语“cultivate”却用于“酵母的培养”,用于“蜜蜂的养殖”甚至“细菌的培养”。看来,“文”字最初的意思影响还是很大的,以至很难把它直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比如英语)中很普遍的用法(如“养殖”意)。汉语中的“文化”似乎代表着一种中国人视为自己身份特征的内在能力。因此,被别人叫做“没有文化”的任何人都可能被一个特定的团体所排斥(即使只是暂时的),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总之,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充当着中国人的整合机制(Watson 1991年)。

个体与整体通过“文”而结成的紧密关系和因果关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伦理学之中,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大学》。《大学》认为,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教化)行为,可以达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和平的目标。

“教育”这个术语就反映了一种等级秩序:根据最古老的中国词源学词典,“教育”的第一字“教”(可以粗略地译为英语中的“education”),就是地位低下者模仿地位高的人(Wang 1995年)。这种解释显示,“教”和“育”两个字是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合为一个词的,但这两个字的来源和含义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大约可追溯至商朝(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教”这个字的最初含义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右边的部分表明正在实施责罚的手(拿着棍子),而左边的部分表明子女的孝顺,包括服侍自己的父母,继承祖先的愿望等。在很早时候,子女的孝顺就已被视为所有目标(也包括政治目标)的基础,孔子本人后来也视其为所有美德的基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第二个字“育”,原来的形状“育”即繁体字是(象征着)一个孩子或儿子倒立着,在古代意指“生孩子”,后来含义扩展了,有成长、抚养和培养(汉代编著的《尔雅》中,“育”就有成长、抚养和培养的意思)之义。战国时期儒家的孟子(公元前372—289年)已经使用“育”字,并把它隐喻为“指导和训诫”。同时,《孟子》也通常被人们当为最早包含“教育”两字的文献来引用。孟子还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当作是品德高尚者的三大乐事之一,排在“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和“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之后(《孟子》1998年:241)。

“教”的含义确立以后,便与其他字构成了新的复合词,所有这些新词都利用“教”这个字的含义。不过,复合词“教育”中“教”的用法却相当勉强。在古代,“学”的思想远比“教”流行,“教”通常被简单地视为“学”的行为的反面。上面引用的经典著作称为《大学》,而不是《大教》。近代著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严复(1854—1921年)在翻译斯宾塞的《教育》时仍用“学”,而不是“教”。直到20世纪初,因为受到日语的影响,包括那些先前只分开使用“教”与“学”两字的人在内的许多人,才开始系统地合用这两个词——“教学”(实际上,是孟子最早用了这个合成词)指称“教育”。1901年5月,罗振玉(1866—1940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使用了这个新词;王国维(1877—1927年)在该杂志的头几期中使用了由日语创造的新词“教育学”来指称“教育研究”。

那么,在整个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环境中,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就传统而言,教育就是培养“文”、“德”、“忠”和“信”(《论语》1997年:91)。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教育的目标与社会和整体统治问题紧密相联,通过教育,个人学会认识到并确认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要对国家效忠和尽责。按照杜维明(Tu,1991年:112)的理解,这种在知识分子中形成良心的传统(使知识分子相信其行为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不会仅仅因为某个王朝受到批判并最终被取代而突然中断。而且,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讨论得较多的并非自由等价值问题,而更多地将注意力转

向了如何保全和延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的问题,即使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这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只有在国家、知识分子、官员和个人的三角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职业”和“劳动”的意义。职业的二元结构强调和强化了国家实体与非国家实体的二分法。“劳动”的语义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对立。我们也可以认为“职业”是由两个字构成的,第一个字“职”指的是(多是儒家)官员的职业或职务,而第二个字“业”指的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词源学词典》1992年:2537)。“职”字(“職”)像汉语中的“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中“圣”的繁体字(“聖”)一样,其左半边也是一个“耳”,意指政府官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即倾听民众,表达公众的意见,寻求最有效的统治策略。“职”字的右半边的“職”由“音”和“戈”(一种古代武器)构成,两者合起来指的是“瞭望塔”,但尽管根据汉字词源的一个大型数据库的记录,人们可以从多方面来猜测“職”字右半部分的含义,事实上,这右半边表明整个字的发音。

指称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的“業”字起先是指一棵树(木)及其叶子(業),之后又表示将书本汇集起来的一片木材(《词源学词典》1992年:1610)。当我们知道“業”字是指将相似的东西(在性格、等级、兴趣等方面相似)捆绑在一起、归为一定类别的意思后,我们或许就能很好地理解“欄”、“線”、“域”、“分支”、“身分”等扩展义,甚至“职业”、“产业”的含义了。这种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的结果就是过度强调农业,从而牺牲了贸易和商业发展,由此造成了19世纪末中国工业、商业的落后。然而,这种士处于最高位,商居于最低位的社会等级结构一直到了最近几个世纪才变得非常清晰、明确。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四个阶层”的结构更有可能是劳动分工以及中国社会某种程度的专业化的结果(Ma 1995年:36—45)。这种阶层的划分并不排斥儒家学者和商人之间的密切的交往、相互帮助甚至建立起友谊,历史上甚至出现了像孔子的学生端木(即子贡)那样身兼富裕的商人、儒家学者两种身份的人物。一直到宋朝(公元960—1279年),上层士人还有可能成为职业商人,从商是士人当时继成为政府官员之后的第二选择(Uberlhoer 1985年)。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随着政府日益卷入经济问题并由此导致了政府官员的腐败时,才又一次在政治上强调“仁”、“义”和“利”(物质利益)在哲学和伦理学上的对立。

“業”字的解释所确认的职业的划分,可以从职业群体的空间分布上得到证实。这种空间分布主要是由于经济和实用的原因,因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地区,经验、技术以及其他信息的交流更加方便,年青一代也更容易接受教育。今天,某一职业的地区性群体依然存在,有时这种群体的一个分支就覆盖了整个村庄。这种“業”所象征的等级秩序也存在着一定负面影响,即让每个人安于其位,政府又将这种等级秩

序高度制度化和合法化。(实际上,孔子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君子忧道不忧贫”)一人一地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减少了改换职业的机会,也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合法地从意识形态浓厚的农村流动到物质上优越的城市。然而,尽管有着严格的国家政策,在现实中,把每个人都限制在他(她)所在的地方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有关情况在后文中会有进一步论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一直是很高的(Herrmann—Pillath 1996年)。

随着1917年黄炎培建立“中国职业教育学会”,“职业教育”中的“职业”一词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虽然此前“职业教育”就被人使用过,可能是山西省教育家姚文栋在1904年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Liu 1997年:136),但“职业教育”首先指的是“实业教育”,而“实业教育”指的是工业技术教育。“实业教育”有时也称为“工业教育”,是由清政府创办的,作为古典教育的科举考试系统的一个补充。之所以创办“工业教育”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的教育系统不能促使国家现代化,无法抵御西方教育的冲击,因此,便创造了四字格言“实业救国”,即“发展工业,拯救国家”。然而,大约从1910年开始,教育家和实业家越来越多地批评这种实业教育,说实业教育没用,与现实脱节;毕业生也不受实业界的欢迎,失业率在上升。这时,职业教育主要模仿美国职业教育,并作为复兴中国的唯一途径而广为宣传。职业教育的倡导者之一,是后来任《教育杂志》的编辑陆费逵,而黄炎培则将职业教育与国家是选择继续贫穷消亡还是富裕和复兴联系在一起。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不再只是“真正的教育”的附庸,而已成为普通教育的部分,但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论述,也没有被公众广泛接受。其结果是,“实业教育”(又是一个日本创造的术语)一词被废除,代之以“职业教育”,而在日本“实业教育”一词一直沿用至二战结束。

在阐述现在的劳动组织之前,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术语是“劳动”,这个词的历史背景显示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劳动”二字的第一个字“劳”,意思是“用力”,第二个字“动”指“活动”、“移动”(包括“重量”和“力气”)。中国早期思想和早期儒家思想并不歧视体力劳动;农民的劳动受到高度评价,因为它可以维持生命。从皇帝到地坛祈求五谷丰登的仪式,以及紫禁城的若干农业标志中可以看到对农民劳动的尊重。然而,至少从孟子开始,就已从思想上为“劳心”与“劳力”之间的对立来为劳动分工的经济需要作辩护。脑力劳动者占据着领导地位,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是应该支持和追随脑力劳动者(Hu 1997年)的。同时,脑力劳动者因其对道德行为和伦理问题的关注而获得统治地位,而体力劳动者的从属地位是与他们相对较低下的兴趣(主要是物质方面)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并非中国思想界漫长历史中唯一的哲学观和伦理观,但它却是一种主流思想,而且历史表明,

它有利于统治结构的合法化。

这种思想导致的结果是,为求富而劳动几乎没有什么道德基础。巧合的是,这正好与中国 1949 年以后的倡导目标相吻合。尽管当时社会广泛宣传的社会主义目标是融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并普遍大力赞扬体力劳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受过教育的人继续看重脑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诸如职业教育之类观念的忽视,因为很明显,职业教育不可能使人实现诸如成为知识分子型领导者的崇高目标。正如朱晓斌(Zhu Xiaobin, 1996 年)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职业教育机构的具体学历与行政干部的具体级别联系起来、挂起钩来以后,职业教育才会更加吸引人,也只有这样,职业教育才能部分地利用古老的科举考试系统的功能结构。即使在今天,接受职业教育、做“普通”的工作,和进入领导岗位从根本上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并不存在什么清晰的理由能让中国公众投资职业教育。事实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对职业教育的消极态度,因为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接受教育,所以很少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职业教育。

二、继续存在的结构:现在的劳动组织和中国的“单位”

事实上,1949 年以后的单位保留了 1949 年以前单位的三个原则,而这三者之中的每一个原则都反映了更早年代的特征。首先,“单位”的行政结构是双重的。1949 年前的单位由军队和党代表组成,1949 年后则由(纯粹行政的)管理者和党代表组成。这种结构的结果又涉及到国家、党的干部(官员)和个人的三边关系,上文已讨论过这种关系。党的干部被要求同时为了政府和单位的成员的利益而行动。这常常会导致角色冲突,使党的干部采用诸如向政府提交虚假报告等多种手段来避免这些冲突。这种国家、党的干部和单位成员之间的三边关系也是雇主和雇员之间并不必然产生相互对抗的原因,而在西方企业中这种对抗却时有发生。其次,单位行使着多项功能。单位不仅履行其初始的功能(比如生产钢铁),而且也满足其成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需要。这再一次反映了过去的地区群体和职业群体的统一,因为在过去,某一特定的职业也同时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的特定生活。直到 20 世纪仍旧存在的各种行会最为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再次,共产主义的思想要求在单位贯彻平等观念(比如,在军官和军人之间,在党的干部和工人之间),这种平等观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在现实中,平等和大同观念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地位的差别始终是明显的。然而,这种观念能够引起相互归属(以及相互负责)的和谐感。这又一次再现了前面解释过的“教育”的观念。实际上,单位里党的干部,在其扮演模范的角色这一点上,也常被视

为教师或教育者。

单位的其他特征更加清楚地揭示了其具有家族、宗族或行会的特点。中国的家族是一种理想的隐喻,也是培养有教养(或“温顺的”)的有责任心的个体的理想媒介。这种家族多采取宗族形式,我们可以视为行会和单位的原形。标准的单位职员终其一生都属于单位,包括退休以后。而且,职员的孩子也出生在单位中,因此,也使单位的职责落到孩子的身上。即使今天,也有方法让一个人在单位中继承其父亲或母亲的地位,甚至接替父母的工作(Bian 1994 年)。劳动者的地位就像一个宗族或行会的成员,长久以来不是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因此,也就不能终止(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不能终止)这种关系。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所有雇员中只有 11%是签了合同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 年)。

三、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目前的体系保留或重新采用了那些围绕着“文化、教育、职业和劳动”等术语展开讨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许多因素。这四个概念很清楚地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观:“文化”和“教育”表达的是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职业”和“劳动”则是指某种被道德或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社会状态。文化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文化阶层构成了独特的精英阶层,他们有明确的任务,即,领导社会那些消极的参与者。文化精英的职责就是保证某些如“义”和“唯物主义”等文化规则、规范得以实行。因此,一方面,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文化决定着知识分子能否进入精英阶层(通过科举考试系统),另一方面,文化又是需要灌输给民众的、更为正式的思想和价值观。这需要借助于教育来实现。教育是一个从底层到高层的过程,过去是围绕孝道原则而展开,而现代的教育手段包括群众运动、自我批评以及由电视宣传推广的道德楷模等。“职业”这个概念反映了社会的两极,区分了精英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精英阶层有着“耳朵”的功能,试探打听并正确地领导群众,而其他阶层则应该听从领导,安于其位。劳动的观念则进一步区分了领导者和追随者。

从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单位既是这些道德教育原则和过程延续的一个例证,也是等级结构化的、强调熟人的社会组织延续的一个例证。单位构成了一个小社会,它将每个成员安置在适当的位置上,并假定变化越少,对单位越有利。其结果,单位保证其成员获得适合其身份、地位的特殊的训练,而对传授更多的、可能有其他用途的普遍技能不感兴趣。显然,这与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现代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人掌握某些技能,而不是将人培养成某一特殊岗位的劳动者。因此,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不仅是传统的教育观念和劳动观念妨碍人们广泛接受职业教育,另一方面,那种把劳动场所视为特殊的、不变的环境的观念也阻止

了职业教育提供灵活多样的劳动技能。由于这些与教育观念有关的原因,职业教育倾向于理论化,从而使得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甚至连某一特殊岗位的工作都无法胜任,这就加深了前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结果是,虽然在理论上大多数的决策者接受“先教育(培训),后工作”的口号,而实际上,在职培训仍扮演着职业教育的角色(Schucher 1999年:39)。1992年,广为宣传的50%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

目标达到了,然而,自那以后,入学人数又在减少了。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职业技术学校除了试图提高职业教育自身的质量以外,还实行了一个政策,即,允许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学生报考高等院校,于是,职业教育之路不再被视为希望渺茫的死胡同了(Schuller 1999年)。不过,这能否真正改变职业教育的地位,或者说职业教育是否不再只是作为进入“真正的”高等教育的跳板,还需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 Bian Yanjie. 1994,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 Hu Jichuang. 1997, *Chinese 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Zhongguo jingji sixiangshi*]. Shanghai: Lixin kuaiji chubanshe.

[3] Liu Guilin. 1997, *Research o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Thought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Zhongguo jindai zhiye jiaoyu sixiang yanjiu*].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4] Hebel, Jutta and Günter Schucher. 1992, *Zwischen Arbeitsplan und Arbeitsmarkt. Strukturen des Arbeitssystems in der VR China*.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5] Übelh ? r, Monika. 1985, Konfuzianismus. In: Michael Kl ? cker and Udo Tworuschka, eds, *Ethik der Religionen Lehre und Leben*, vol. 2, *Arbeit* (119 - 133), Munich/ G ? 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6] Herrmann - Pillath, Carsten. 1996. *Wachstum, Mobilit ? t und sozio - ? konomischer Wandel: Traditionelle kulturelle Strukturen als Medium der Modernisierung Chinas*. Duisburg Working Papers on East Asian Economy. Duisburg: Duisbur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7] Schucher, Günter. 1999. *Chinas Besch ? ftigungsstrukturen im Wandel*. In: Jutta Hebel and Günter Schucher, eds, *Der chinesische Arbeitsmarkt: Strukturen, Probleme, Perspektiven* (23 - 44). Hambur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8] Gernet, Jaques. 1972. *Le monde chinois*. Paris: Armand Colin.

[9] Fazzioli, Edoardo. 1987. *Understa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0] Ma Min. 1995.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The Commercial Century of the Closing 19th Century in Changing Society* [*Guan shang zhi jian: shehui jubian zhong de jindai shenshang*].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bor and career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ULTE Barbara¹, WANG Yi - fan², PENG Zheng - jun²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umboldt, Berlin, Germany;

2. School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 The Chinese concepts of the culture, education, career, and labor help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properties of them.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 are especially influential for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values. This paper performs the etymological and semantic analyses of the terms, describes the special employment organization or unit in Chinese, and exemplifies the order and harmon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background.

Key words : concept; culture; education; career; unit; influence

[责任编辑 宗健梅]